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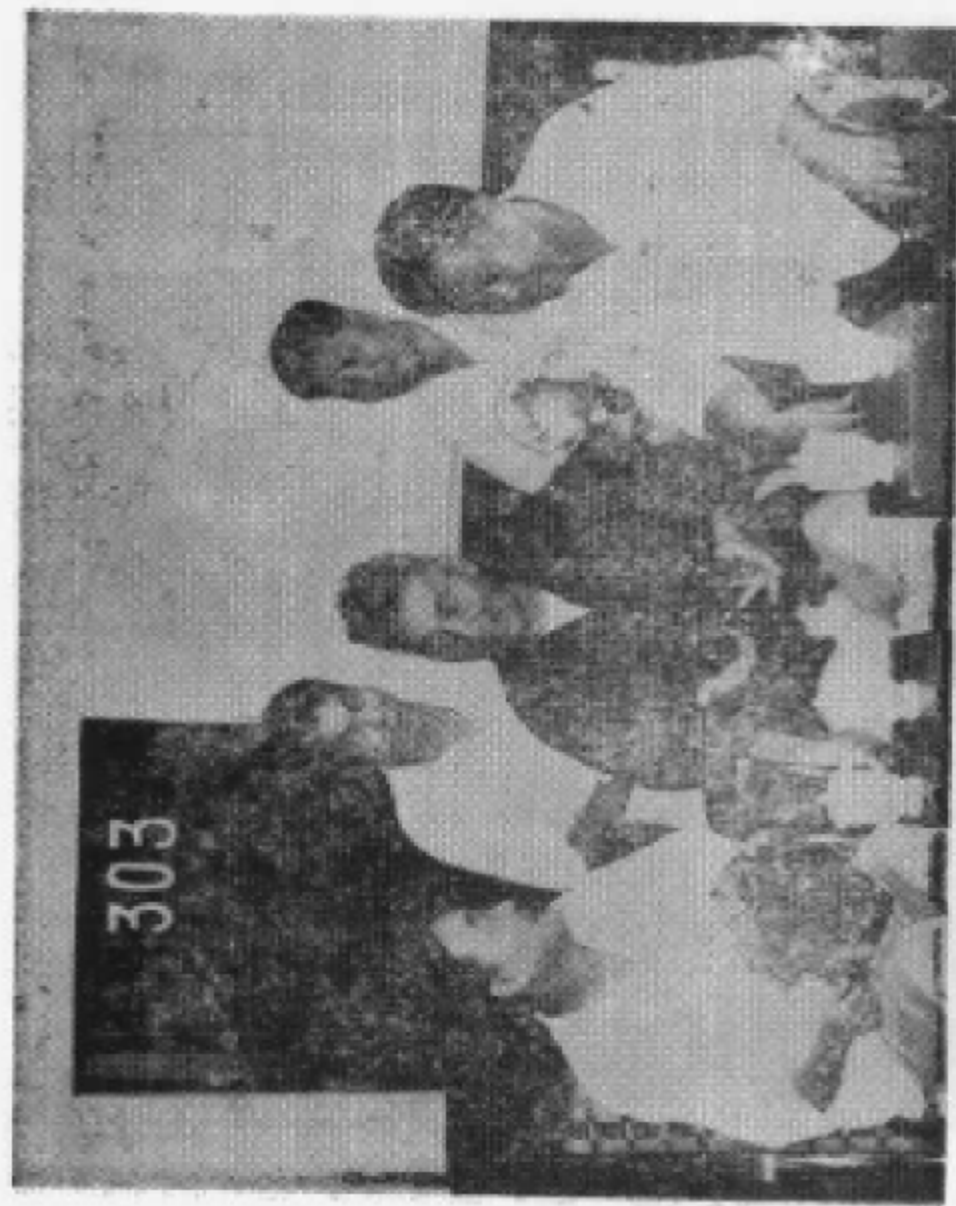


為歡送周氏的撤影影

前排左起：陳開明、段建文、向邊、周的民、梁子庠、谷雪亭同志；

後排左起：何白戈、熊治平、周明祥、張士林、黃春梅同志。

照片供稿：鄭德明



一九八二年八月梁子庠同志应邀来县撰写解放正安史料

前排左起：陈太林、梁子庠、孙伦贵同志，

后排左起：郑德明、贾昌辉同志。

摄影：谢明贵

目 录

前言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成人员	(2)
解放前的正安教育	县政协文史办 (3)
抗日救亡运动在正安	
.....	县委党史办 县政协文史办 (53)
郑一平在端恭	袁照明 (61)
解放正安概况	县政协文史办 (65)
回顾正安解放	梁子庠 (72)
正安解放初期剿匪斗争的片断回忆	周的民 (92)
归园记	郑德明 (100)
正安县城复活了	周的明 顾绍炯 (101)
同反动势力搏斗的四十五天	杨鲁峰 (104)
米粮阻击土匪 和溪显示威力	
.....	陈太林 贾福波 (115)

武工队的活动	陈太林 贾福波	(121)
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记正安县第一期知训班	陈太林	(126)
正安县各代会始末	郑和周 <u>陈开明</u>	(136)
忆土坪督导处	<u>陈开明</u>	(146)
正安县烈士英名录	县政协文史办 民政局	(156)
忆李丽生同志	梁子庠	(176)
缅怀吕德福同志	李扬汲 李可贤	(180)
回忆陈体泉同志	<u>陈开明</u>	(184)
乙丑清明扫墓诗词		(192)

前 言

正安文史资料第二辑，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今天出版了。

本辑内容主要刊载了从清末至解放，正安的教育发展史，抗日救亡运动在正安的史实，回忆两次解放正安和剿匪斗争的史料，还记载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争以及在捕捉武装歹徒、保卫社会治安等斗争中牺牲的烈士英名录等。

本辑能较快地出版，承蒙县党史办、民政局等单位和两次参与解放正安，曾同土匪浴血奋战过的老干部亲笔撰著以及各界知情老先生的热情支持。在此谨致热忱的谢意。

我们水平不高，史识贫乏，其中错误难免，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德明

副主任委员：李可贤

委员：石勋

龚克威

简承俊

谢明贵

解放前的正安教育

县政协文史办

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莫不取决于人才之贤愚得失，人才之贤愚得失，莫不取决于教育之是否兴旺发达。盖教育乃培育人才，传授知识，提高民族文化，发展科学技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国家要不断地富强，人民要不断地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日新月异以至于无穷，也离不开教育为之先导。故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把发展教育，广出人才，为其强国富民的基本国策，并利用教育来巩固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以达到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之目的。

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同时强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由此可知，使国强民富，蕃衍绵延，奠定万世不拔之基业，教育确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伟大事业。我国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四大古国之一。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虽各不尽同，但在缔造祖国民族文化，传授祖国发明的科学技术，树立伟大的民族气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重大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是光辉灿烂、万代流芳的。

正安地处黔东北边陲，解放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上封建统治阶级厉行愚民政策，禁锢人才，办教育和享受教育的权利为少数人所占有，以致广大人民长期摆脱不了贫穷愚昧的状态，若干年来物质文化生活进步缓慢。尽管如此，而社会发展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历任州、县官吏有远见卓识，重视教育事业者不乏其人；地方贤达，热爱教育，支持和献身教育事业终身不懈者比比皆是；社会人士捐资兴学者蔚然成风；青年子弟勤学励志，力求进步，在本县各级学校毕业后到省城升学，甚至到外国留学，然后又回县服务者亦接踵而起。由于上述各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解放前正安人民的文化水平便有了相当基础，政治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觉醒，尊师重教之遗风，至今犹盛行于民间，因而对正安现在的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优良影响。兹根据《续遵义府志》第十卷、第十五卷、第十八卷及《正安县志》初稿第十一卷之记载，并结合我办访问、调查、座谈所得之资料加以整理，对正安县解放前的教育事业作出如下记实：

（一）教育宗旨、学制、学校

“戊戌变法”为中国的教育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清朝道光时代以前，正安全县都是一村一寨或几个富室联合自备束脩，聘请教师，开设塾馆，授受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练习书法，以应朝廷乡、会、殿试，博取功名而求出仕。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正安知州黎怀任内，责由地方官考试，聘请教师，设立义塾二十二所，其中：县城一所，德溪里九所，三江里五所，思宁里五所，思七甲、周盖垭各一所，仍授四书五经。但是，这种长时期的封建教育，不仅导致政治上的腐败，而且招来列强步步侵入，国内志士仁人纷纷起而斗争，力图变法图强。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

四年），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得到军机大臣翁同龢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光绪皇帝接受他们的主张，引用维新人士，颁发维新法令，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可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持陈规，反对变法，幽禁光绪帝，捕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道宽等数十人。“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其维新思想影响却逐渐扩大。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政府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开始实行新政，把教育改革作为实行新政的重要内容，继“壬寅学制”后，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癸卯学制”。一九〇五年，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成立学部，统辖全国教育，并由学部公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癸卯学制”规定小学九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三年，太学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并规定设立相应的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自此结束了中国沿袭两千多年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封建教育制度。但是，实行“癸卯学制”，主要是清朝政府出于自己政治上的需要，并不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仍然保持了大量的封建性成分，办学的目的是培养“通才”，也就是培养“行政官吏”，各级毕业生，仍按科举制，授予出身和官阶品级。高小毕业生授为廪生，中学毕业生授为贡生，大学毕业生授为进士。学校课程保留了读经、讲经，排斥女子于学校教育之外，为权贵单设贵胄学校，实际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近代资本主义学制也大不相同。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

(民国元、二年)，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再次酝酿教育改革，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对“癸卯学制”的封建性部分做了一些修改，经过十年的努力，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又公布了“壬戌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六年（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中等教育六年（初级和高级中学各三年），师范学校六年，其中后期师范学校三年；高等教育三至六年（大学四至六年，专门学校三年以上）。小学入学年龄为六岁。“壬戌学制”（即大家通常说的六三三四制）的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个学制，不仅废除了“癸卯学制”，而且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方面的混乱状况，使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到三十年代达到了新教育兴起以来的最高水平。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虽经几次修改，但基本上是沿用“壬戌学制”。当时受世界各国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曾主张“德、智、体”三育、“德、智、体、群”四育和“德、智、体、美、群”五育。抗日战争时期，以“抗日救国”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教材从各家不同版本统一改为“抗建读本”。解放战争时期，正安是国统区，教育是为其“戡乱救国”服务，实际上中共通过地下工作大量输入、传播了“反蒋、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思想。

追溯解放前四十五年新学的兴起和演变，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予以分述：

一、清末时代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贵州巡抚林绍年，根据

清廷“立停科举”的诏谕，按照“癸卯学制”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首先在贵阳开办师范传习所，并责由各州、县选送举、贡、生员入传习所，学习时间为三至六个月，结业后回州、县办小学堂，这个传习所共办了三期。

同年，在省城开办师范传习所的推动下，正安知州郎承谟积极推动新学教育，支持开办新学，亦开办师范传习所于鸣凤书院（现县委职工家属院），规定招收廪附生监入所传习，半年毕业。主要为创办新学培养师资。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知州郎承谟继办师范传习所后，在县城续办蒙养学堂四所于东岳庙（现正安一中）、万天宫（现县公安局）、禹王宫（现县人武部家属院）、万寿宫（现凤仪区公所）。修业期间为两年。师资由师范传习所毕业生中分配。

一九〇七年，由于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在省城开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和初等小学堂九所的推动，正安知州郎承谟亦在县城首创高等、初等小学堂各一所，同时设立预科。就是说，学生在初等小学堂修业期满毕业后，必须进入预科学习一年，然后择优升入高等小学堂，以保证学生质量。仍按“癸卯学制”，初等小学堂的学习时间，包括预科一年为五年，高等小学堂的学习时间为四年，共九年。所以这两所小学堂一直办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在这两所小学堂任教的教师有闵仲谦、郑作卿、李筑贤、张次侯、湛海澄、陈西园、刘德章、王凤翔等。担任英文教师的李筑贤，就是从贵阳请来的。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知州龚蔚铨任内，开办两级学堂于大路槽韩氏宗祠（现道真县属）。修业时间，按“癸卯学制”初等五年，高等四年，共九年。在一九二三年（民

国十一年)五月,被川匪李昌荣、刘国辉部纵火将校焚毁。

以上高、初等小学堂和大路槽两级学堂的创办,就是正安传授新学的开始。

二、民国时期

一九一二年民国诞生后,教育部颁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女子学校以“贞静、诚朴、勤俭、活泼”为校训,废除“癸卯学制”,实行“壬子癸丑制”,将清室所建学堂名称,一律改称学校。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县长全焕勋任内,广办学校,发展教育,在全县办了四十二所初级小学校。其中,万家桥初级小学,还是一九一四年建立的。并将清时所办的县城高等小学堂,改名为高等小学校,学制三年,同时将初等小学堂,改名为模范小学校,学制和其它初级小学校一样为四年,因此,这个时期学生修业的时间共为七年。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县长陈绍端任内,将城区高、初级小学校合并为“正安城区两级小学校”,安场小学校升为“正安县安场两级小学校”,其修业时间,按“壬子癸丑学制”,连同大路槽两级小学校在内,一律改为初级四年,高级二年,共为六年,而高级叫高一级、高二级。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匪患成灾,兵连祸结,县城失守,学校停办。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县长饶焕彩任内,恢复所有学校,城区小学恢复后设在雷祖庙,校长丁朝珍,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迁入考棚(现县人民法院)。县长沈旦任内,正安、道真两县分治后,将这两所两级小学校更名为“正安县凤仪镇中心学校”、“正安县安场镇中心学校”,同时在土坪、庙塘、新州、格林等二十个乡建立中心学校二十所,名叫“正安县

××乡中心学校”，并在全县各保建立保国民小学二百三十多所，一直到全县解放。

在正安县城区两级小学校和中心学校当过校长的有丁联璧、杨禹铸、江珩宣、张国钧、郑德渊、杜裕黄等（见表五），在安场两级小学校当过校长的有郑和周、曹受棋等（见表七）。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县长陈绍端任内，创办正安县城区女子小学校于江宅的“济阳世第”（现盐业公司仓库），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年匪患失城，女校停办，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县长饶焕彩任内，将女校仍恢复于江宅，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入万寿宫（现凤仪区公所内），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又迁入下堂衙门（现县人武部），学制四年。在这所女校当过校长的有邱兆麟、刘恩敏、颜昌华、姜莹仙等（见表六）。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县长沈旦任内，实行男女合校，城区两级小学校和女子小学校合并，更名为“正安县凤仪镇中心学校”时，将高一、二级更名为五、六年级，直到解放。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县长陶汝耕任内，建立安场女子小学校于万天宫（现安场粮食仓库），学制四年。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与安场两级小学合并，一九四二年更名为“正安县安场镇中心学校”时，高一、二级更名为五、六年级，直到解放。在安场女校当过校长的有冯云溥、冯廷珍、陈维祯、颜昌华、冯帝裔等（见表八）。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县长黄群书任内，于是年春，创建正安师范于文庙（现县委大楼地址），培训师范，学制一年，只办了一期，校长由黄群书兼任，副校长是前清文生和贵阳师范完全科毕业生闵仲谦。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随着正安师范的结束，

社会人士请求开办中学以满足民众子女求学的迫切愿望，因而在县长周凤文任内，便创建“正安中学”于文庙（现县委大楼地址），只设初中班，学制三年。这所中学所招第三期学生，编为师范班进行教学，培养小学师资（其校长名录见表四）。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县长张礼纲任内，仍感师资不足，再办“正安县简易师范”于万天宫（现县公安局），直到全县解放为止，共办了五期，第四、五两期没有毕业就解放了。在这所师范学校当过校长的有陈世宇、张相臣、陈凤梧。他们都是正安县人、大学毕业生。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县长周凤文任内，办两所短期小学于县城和土溪（现道真县属）。县城的短期在东岳庙（现正安一中），校长、教师都是陈林奎一人，只办了一年。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以江亭诚为首，使用江西会馆产业收入和万寿宫门前米市斗息收入，组建私立豫章小学于万寿宫（现凤仪区公所），共招生两期。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老师有陈代芳、雷雨高。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以富绅刘纪常为首，建立乐源小学于原来的女校（现县人武部），只办了一年就停了。校长是刘家骥。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正安简易师范为便于本校学生实习，组建师范附属小学，只办了一年。学校负责人是郑周栋、张坤福。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正安县民众教育馆内，设置教育股，辅导村寨夜校的扫盲工作。

这个时期，全县的边沿村寨，仍有塾馆，启蒙儿童，以

补新学之不足。抗战胜利后，这种塾馆，即自行消失了。

(二) 教 材

各类学校的教材，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学制而定。

清朝末期，按“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和“癸卯学制”，师范传习所授四书五经、国文、国音、修身、格致、算学，蒙养学堂授的课程与师范传习所相同；初等小学堂授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音乐、体操、习字共十门；高等小学堂授读经、讲经、温经、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算学、格致、英文、图画、音乐、体操共十三门；大路槽两级小学堂的课程与初、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相同。

民国时期，根据“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和“壬子癸丑学制”，初小授国文、修身、算术、图画、手工、体操、唱歌、习字八门；高小授国文、修身、算术、图画、手工、体操、唱歌、历史、地理、自然、英语、习字十二门；中学授国文、公民（修身改的）、数学（包括代数、三角、几何）、英文、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体育、历史、地理、军训、音乐、美术共十三门；师范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美术、音乐、劳作、体育、化学、政治、习字、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共十四门。这是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正式课程标准》颁布后，才陆续对课程作的修改。女子学校授国文、修身（后改为公民）、算术、图画、体操、唱歌、缝纫、刺绣、家事、习字共十门；短期小学授国语、算术、习字、唱歌；私立豫章小学授四书、国语、算术、习字；一九四一年县城和各区乡镇的小学校改为中心学校，一

至四年级授国语、算术、图画、体操、音乐、公民；五、六年级增授历史、地理、自然课，民众教育馆教育股，主授识字课本，目的在于扫盲。

（三） 教育行政机构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由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负责。其主要任务：贯彻教育方针，推行教育法令，拟定教育规章，编制教育计划，审核教育经费，任用教育人员，视察、指导和考核所属学校的工作，处理教育各项问题等。因此，清末至民国时期，正安县都设有教育行政机构。

清末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正安州设学正署于鸣凤书院（今县委职工宿舍）并设训导署于下堂衙门（今县人武部）。学正署设学正职，是管理全州教育的行政领导，训导辅之。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至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学正是贵阳府举人段绥之，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训导是安顺府举人易振寰，直到辛亥革命。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贵州都督府政务处下设教育司，管理全省教育工作，并规定各县设立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事宜。正安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仍设立劝学所于鸣凤书院，首任劝学所所长为王凤翔，继之是闵仲谦、邱兆麟。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贵州省政府政务厅的第三科管理全省教育，正安县同时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地址在鸣凤书院（今县委职工宿舍）。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贵州省政府、除民政、财政两厅之外，增设建设、教育两厅，正安县政府仍设教育局，地址没变。先后任过教育局长的有闵仲谦、朱孔阳、邱兆麟、赵促成、陈其鑫、闵哲知。一九

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改教育局为教育科，直到全县解放。先后任过教科长的有阳育之、杨承祿、杨文书、梅友松、周立礼、陈裕宽、刘云飞、周镜泉、李秉中、杨本孝等（见表二）。

（四） 教育经费

据《正安县志》初稿第十一卷载，解放前正安的教育经费，清朝时期靠斗息、屠捐，民国时期来自斗息、屠捐和黄田三项。

一、斗息。清朝道光年间，全县学堂，都是一村一寨，几家十家，或富户一室，自聘教师，自备束脩，儿童就读。道光十七年，知州周藩任内，始办义学于县城西门，名叫城西义学，但因经费无源，不久即废。同治十一年，知州黎怀任内，在全县创设义学二十二所（城中一所，德溪里九所，三江里五所，思宁里五所，思七甲一所，周盖垭一所），除思七甲、周盖垭各一所，教师由地方自聘，款亦自筹外，其余二十所，教师由官府考试录用，所需经费，规定以其场之斗息收入支付教师束脩。

二、屠捐。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知州郎承漢任内，创办高等和初等小学堂于县城，所需经费，仍使用斗息收入外，并规定以各场屠捐收入补充教育经费。

三、黄田、又叫学田。正安黄田为光绪二十三年知州郎钟茂所创设，至光绪三十二年，当时经管黄田收支的鸣凤书院斋长（由知州在生员中遴选委任）曾习九，人故乏嗣，其经管十年的契约、簿据丧失无存。虽经知州郎承漢提询其亲属，终无所获，以致黄田产业无从稽考。旋经劝业所所长王凤翔、闵仲谦先后数载多方清查，理出头序，另行出佃，新立坐簿。全县黄田分布在七个区（包括道真分的三个区），